

# 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的价值共识与当代启迪

周 雯<sup>①</sup>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在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历史上，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先生是两位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民间外交理念具有树立正确历史观、珍惜中日友好、重视民众作用、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共识，为二人开展对话、结下情谊提供了坚实基础。他们的思想启迪着今日的中日两国树立正确历史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开展平等的对话与交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关键词：**周恩来；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共识；启迪

周恩来总理为浇开中日友谊之花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建国初期就强调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通过民间外交在两国人民中播种友谊。池田大作先生也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他们的努力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民间外交思想中蕴含的价值共识对于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促进民间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领导和从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实践中，周恩来总理对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工作方针等作出论述，形成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重要思想，在推动中日友好往来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池田大作先生基于其人本主义理念以及对世界和平理想的追求，对中日民间外交也多有论述，彰显出他对中日交往的独特见解与视角。

### （一）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在战后初期，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官方关系几乎断绝。然而，周总理敏锐地认识到，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基础和愿望。基于中日双方人民经济互惠的需要，他指导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等文件，使经济贸易成为了中日关系解冻的最初突破口。1955年，周总理在谈到中日关系问题时提到，“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当然，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见”<sup>②</sup>。在接待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文化代表团时，他指出，在两国政府无法发展直接的官方接触前，两国人民应该多联系、多来往，这样有利于铺平道路，促进两国人民共同建立良好的友谊。如果两国的团体能够做好两国要合作的事务，最后只要两国外交部签字就是最好的方式。

<sup>①</sup> 周雯，女，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46。

民间先行，意味着首先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人员往来方面的交往。以民促官，即通过民间的友好往来推动官方关系的发展。随着民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日益加深，这对日本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改善日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抓住时机，积极与日本的政治家、企业家等进行接触和沟通。他在会见日本友好人士时，多次表达了对发展日中关系的重视和期待，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政府传递中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在周恩来总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民间贸易的发展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人员往来则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些民间交流活动逐渐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决策，推动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上的转变。

“以官带民，官民并举”。1972年中日建交后，曾有很多人认为，两国民间外交的使命已经实现了，今后不再需要民间人士了，中日两国发展关系通过政府间进行即可。而周总理并不认可。他指出，“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相得益彰。发展民间外交有利于巩固官方外交，促进官方外交事业发展，同时有利于畅通民间渠道”<sup>①</sup>。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以中日友好为共同的目的，应当相互协调配合。官方外交为民间交流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民间交流的蓬勃发展也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官方外交的进程。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周总理“以官带民、官民并举”思想的指导下，民间外交并没有停止或中断，反而继续更为广泛、深远地发展。

## （二）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在《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倡言中，池田先生曾提出“一开始就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的共识，从大局、基本方针路线来落实”的设想。<sup>②</sup>但日本当局追随美国，奉行敌对和仇视中国的态度。基于这种现实，鼓励民众开展交往、对话就变得尤其重要。在各种中日民众外交活动中，池田先生反复强调在野政党、民间团体、广大民众都应参与到为和平的共同努力之中。“一个人一个人的努力看起来就象水滴那么微小，但它最后能穿透石头，汇成可以冲走岩石的大河。要达到和平的目的，只有不断地采取果敢的行动和进行具有勇气的对话。”<sup>③</sup>民间外交应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需求，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传递和平的理念和价值观。

<sup>①</sup> 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 1945-1995[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77.

<sup>②</sup> 池田大作.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0.

<sup>③</sup>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50.

**强调“对话与理解”**。在中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诸多波折和困难。池田先生始终坚信，基于平等的立场、彼此尊敬的态度、互相包容和理解的目的而展开的“对话”，可以打破隔阂，消除误解。他曾指出，对话是“立足于‘人’这一共同的大地，不断开辟理解和信赖的‘共生’的大道”，是“自己与他人共同提高对和平与幸福的追求的‘和谐’的王道。”<sup>①</sup>他身体力行，积极与中国的各界人士展开交流，从学者到艺术家，从企业家到普通民众，以开放的心态倾听不同的声音，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理念。这种对话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交流，更是心灵的沟通，不仅加深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也为中日两国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坚定“和平使命”**。战争只会带来破坏和痛苦，而民间外交则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通过民间的力量，可以推动中日双方政府采取友好的外交政策，而中日友好又是推动世界和平的关键。池田先生发起了许多和平倡议和活动，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共同为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环境污染的世界而努力。

## 二、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民间外交思想的价值共识

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民间外交思想，建立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前提下，以珍惜和维护中日两国友好为共同的核心理念，都重视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并以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为远大理想，代表了中日两国人民向往和平的内在心声。

### （一）树立正确历史观

用怎样的历史观看待中日两国的交往交流史、引导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是新中国建国后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前提。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这一声明表明了周总理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周总理提出“两个区别”，强调要区分日本人民同帝国主义政府，区分一般官员同政府决策者，并主张提高广大人民外交的政治素养，为后来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活动奠定了根本前提。随着岸信介政府对中日关系的破坏，周总理又提出了“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等主张。“两个区别”思想是对历史过往的回应，要求将日本右翼政府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对待，确立了看待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等主张则是对当下的要求，明确了当代加强两国友好往来的中心思想与政治底线。不仅在当下要强调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共处，更应共同珍惜和平、谨记历史、防止战争的重演——“中日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是最重要的。”<sup>②</sup>

<sup>①</sup> 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池田先生也认为要“以史为戒”，不能否认和掩盖以往的错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日军侵略了对我们有传播文化之恩的贵国（即中国，引者注）和其他亚洲各国，不能忘记他们蹂躏他国的暴行。”<sup>①</sup>铭记历史，并不是要传递仇恨。相反，决不能将“过去的战争伤痕的沉重包袱”，遗留给两国的下一代青年，而是“要以史为戒，为了和平的未来开拓友好之路。”<sup>②</sup>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命运共通的意识，才能拥抱和平幸福的未来。池田先生积极推动中日友好交流，正是基于他对日本侵中历史实事求是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他的行动和理念与周总理的主张不谋而合，共同为中日两国树立正确历史观、推动友好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珍惜中日友好

周总理的一生与日本有不解之缘：弱冠之年，东渡扶桑寻求真理；不惑之年，救亡图存坚持抗战；古稀之年，呕心沥血重建中日邦交。尤其在建国后，周总理力争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中多次表达对中日友好的向往。他从开展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人民交往、增进民间团体协商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民间交往对中日友好的追求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屡遭挫折。由于民间交往缺少国际法和政治、法律上的保障，当美国、台湾施加政治压力时，日本政府便屡屡对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予以打击。吉田茂政府阻挠中日民间贸易、岸信介政府破坏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佐藤荣作政府则力图抗拒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对此，周总理进行了坚决斗争，提出“贸易三原则”、“政治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等原则，并始终对中日友好寄予希望和信心。他在会见高碕达之助时说：“中日贸易的发展应该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行……我们应该披荆斩棘，不把障碍放在眼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努力前进。”<sup>③</sup>

池田先生对中国的评价是“日本的文化恩国”、“世界和平的关键”。即使是在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反中反共情绪弥漫的1968年，他也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倡言”指出，中日友好不仅是两个民族数千年来历史交往的传承，也是协调中美关系、化解核战争威胁、顺应时代潮流趋向的必然。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直接关涉双方的自身利益，更是“同为亚洲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伟大贡献直接联系的”<sup>④</sup>。在实践上，他将中国情结与反战和平思想相结合，终身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他通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友好会面、同许多中国学者进行对谈、在中国高校进行演讲、举办中日青年交流活动、出版著作等种种行动践行其对中日友好的追求。

---

593-594.

<sup>①</sup> 池田大作，顾明远.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34.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121.

<sup>④</sup> 池田大作.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0.



### （三）重视民众作用

周总理的民间外交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积极主体，是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这一思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①</sup>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人民立场。基于这样的立场，周恩来总理终生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他所主导的民间外交，也始终以关注人民的需求、考虑人民的利益、发挥人民的力量为核心。他最初希望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正是因为看到了双方人民利益互补的需要。“外交是通过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sup>②</sup>“中国人民早就表示，现在仍然表示：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保障远东和平。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于中日两个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益的。”<sup>③</sup>中日民间外交以两国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大众的行动和参与为发展的动力，从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发展到“半官方外交”，以此“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并“推动”政府建立两国外交关系。

池田先生则在秉承日莲佛法、继承牧口价值论和户田生命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民众外交”思想，强调尊重个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重视民众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政治与经济的往来如同海上的船只，而民众之间的友谊就是承载船只的“大海”。“民间外交作为民间层面上的交流，是通过超越利害关系、呼唤和平的民众间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奠定起牢固的信赖和友情。”<sup>④</sup>这一理念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二战后，中日两国政府因“大义名分”以及外部压力等原因互不往来，但在民间层面上，却有着友好往来的利益需求与希望。正是数十年间中日民间的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积累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发展历程也证实了周总理和池田先生重视人民作用的正确性。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与池田先生所指的“人民”，具有国际性的意味。正如池田先生曾多次表示，“总理的‘为人民’，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总理而言，‘人民’绝不只是中国人民，他没有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别对待。”<sup>④</sup>

### （四）维护世界和平

致力于亚洲与世界和平是周总理与池田先生民间外交思想的共同的远大理

<sup>①</sup> 田恒.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0.

<sup>②</sup>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社，1955：96.

<sup>③</sup> 孔繁丰，纪亚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5.

<sup>④</sup> 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62.

想。周总理生逢中华大地内忧外患的年代，亲身参与并领导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他努力促成国共合作，领导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等方式解决国内矛盾，为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曾在多个外交场合代表中国人民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他以坚定的信念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广泛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相待以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理念，既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和平的主基调，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中日关系上，虽然代表着饱受伤害的被侵略国，但周总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仇恨的层面，而是指出，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要把日本政府犯过的错强加到日本人民身上，没有人希望经历战争，日本人民也一样。“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sup>①</sup>

与周总理一样，池田先生也同样是战争的亲历者、反思者，他从失去兄长的痛苦体验中萌生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基于日莲佛法和生命哲学，以及墨家“兼爱”等理念，他倡导“人性主义”、“生命至尊”观念，提倡珍爱生命、以人为本。池田先生指出，“最高最尊之宝，除了生命而决不会有其他。应当把一切的基点放在这一单纯的事实之上。”<sup>②</sup>战争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践踏，而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核武器等技术的进步，各国的空间距离已不再存在，战争的威胁更加严峻。人类要避免集体自杀的结局，就必须废除核武器、消除战争、维护和平，实现全人类普遍的爱。

池田先生与周总理的民间外交思想，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将国家的友好关系扎根于民众之间，建立起彼此信赖、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以服务中日友好，实现亚洲及世界整体和平这一最终目的。这既源于他们二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也真实地代表了日中两国乃至亚洲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内在心声。

### 三、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启示意义

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仍未解决，政坛右翼分子对历史的模糊态度、对台湾问题的挑衅屡次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日本在国家安全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也不断扩大……在两个民族数千年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过程中，作为亲善和睦反面的龃龉不合无法避免，而如何最大程度地扩大友好亲善的情谊，制止仇恨敌对的态度，是当前中日民间交往的愿望，也是周总理和池田先生共同的期盼。回顾周总理和池田先生关于中日民间外交的思想，我们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226-227.

<sup>②</sup> 池田大作.人生箴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166.

能从中得出诸多启示。

### （一）树立正确历史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1972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并宣示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这是当时日本政府坚持正确历史观的体现，也是中日关系50年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与新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日本政府在部分保守主义政客与右翼势力鼓动下，不顾中日两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诉求，试图淡化、歪曲日本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和钓鱼岛等一系列历史或领土问题上的言行，与两国邦交正常化初期的正确历史观渐行渐远。错误的历史教育导致部分日本民众对历史真相缺乏了解，对战争责任认识不足。同样，中国国内也存在着对日本的片面认识。在中国互联网上，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个别网民、自媒体在网上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虚假信息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由于历史的伤痛，部分中国人对日本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容易将个别日本人的行为扩大到整个日本民族。这都不利于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和开展正常的民间交往。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首先需要加强对社会民众的历史教育、和平教育。池田先生认为，“开拓未来，维护未来，其主体在于‘人’，而造就‘人’的事业正是教育。”<sup>①</sup>中日两国都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客观、全面地向民众传授真实的历史知识，让下一代青少年了解中日友好交往的长期历史与演变过程，培养他们正确、理性、客观看待历史问题的能力，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以人为本、珍爱和平的种子。培养具有对世界的关怀与慈悲、具有和平追求、能够尊重世间其他生命的“世界公民”，也正是池田先生的教育理想。其次，需要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中日两国的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客观、公正地报道历史事件和两国关系，避免片面性和情绪化的表达。积极宣传两国民间交往的成果与事迹，为民间交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互联网时代，两国都应积极推进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构建完善的网络宣传引导体系，对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予以积极合理的引导，对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宣扬中日仇恨等现象予以整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日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合作，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为民间交往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日本政府应当为同亚洲邻国增进互信、实现和解作出真心诚意的努力，在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上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始终如一。只有正确看待历史，才能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建立信任，推动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日两国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努力，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

<sup>①</sup>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集[M].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3: 265.

## （二）重视民间交流，发挥“对话”的力量，求同存异

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民间外交思想启示我们，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sup>①</sup>“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sup>②</sup>无论两国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两国民间友好的基础性作用始终没有减弱。近年来，中日两国民间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经贸合作等方面的规模持续扩大，社会认可程度也日益提升。据2023年“北京-东京论坛”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65.7%的中国受访者与62.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日应共同实现的最重要的目标和理念是“和平”。61.5%的中国受访者和53.1%的日本受访者肯定民间交流对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sup>③</sup>当前，仍然需要发挥民间外交的优势与传统，努力消除误解和偏见，进一步加强两国社会、文化、教育以及青少年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依托两国间友好城市众多、友好团体活跃的独特优势，真正构筑起中日世代友好的稳固基础。

在中日的民间交流中，应发挥平等对话的力量，秉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的原则。周总理曾集中阐发“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sup>④</sup>求大同、存小异。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致力于实现中日友好、两国互惠共赢的“大同”。池田先生也指出，“对话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包容不同的事物。虽然彼此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但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真正的对话，来拓展人类共同的大地；如何用对话的力量，来联结世界，提高人类。”<sup>⑤</sup>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较早地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文化和社会模式。而中国则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孕育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这些差异同样也会反映在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在交往中，彼此都应该尊重这些差异，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避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只有遵循平等、公正、互利的原则，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基础，积极寻找共同的利益点，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弥合分歧，才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sup>①</sup>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16 (001) .

<sup>②</sup> 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5-23 (002) .

<sup>③</sup> 中国外文局.第十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发布[EB/OL].[http://www.cicg.org.cn/2023-10/11/content\\_42547748.htm](http://www.cicg.org.cn/2023-10/11/content_42547748.htm),2023-10-11.

<sup>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3.

<sup>⑤</sup> 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2.